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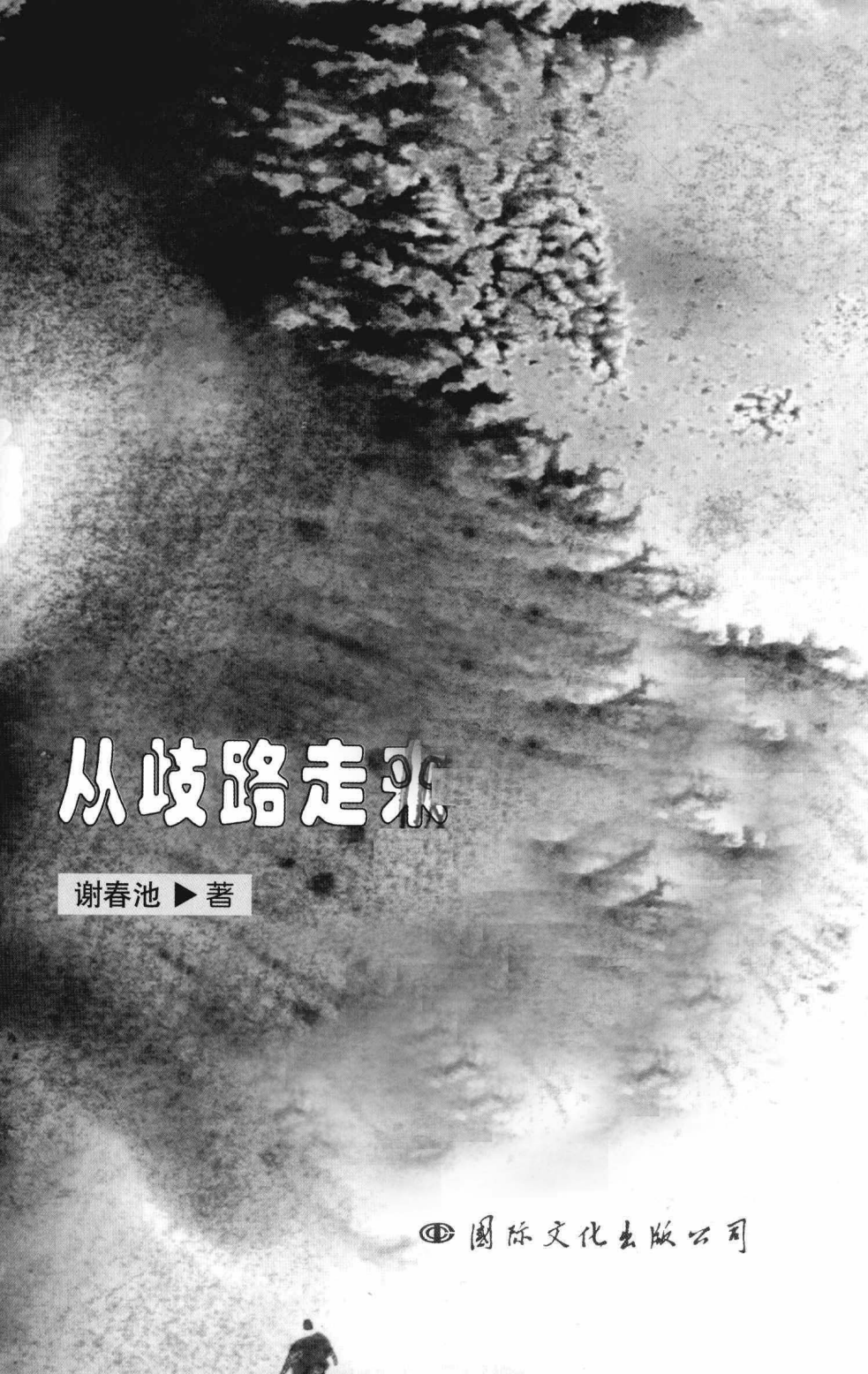
● 谢春池作品编年选

文学评论卷

从歧路 走来

谢春池 ▸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从歧路走来

谢春池 ▶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春池编年作品选(文学评论卷)/谢春池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5

ISBN 7-80105-542-X

I. 谢… II. 谢…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48326 号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印 刷: 北京新新印刷厂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6.5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0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5-542-X/G·202

定 价: 15.00 元

自序

从歧路走来。

我确实是从歧路走来，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评论；而以这句话作为我这本文学评论集的书名，尤为贴切，特别能表达我文学的真实历程，当然，这也表明我个人对自己文学之旅的迷失与过错的正视与反省。这种正视与反省并非起自今日，早在 80 年代中期，我就这样做了，否则，我不会有以后在创作与评论这两方面的实实在在的收获。

何为歧路？简言之，即：摧残否定人类文化成果并失却人性还自以为在创造新文化解放全人类的那条所谓的“康庄大道”。体现在我的文学评论是两篇尚存“文革”遗风的《新诗向何处去》（1980 年夏）以及《关于诗歌的震撼力》（1983 年冬）。我不认为两文所有的看法都错，当年的某些观点今天重温，还有其可取之处，但，那种以极左的政治狠批文学之美的荒谬性显而易见。这也正是我之歧路的要害所在。

兴趣哲学于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我也就必然地兴趣文学评论。我深知自己既未学贯中西亦未博识古今，加之学

养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作的文学评论大多肤浅苍白,少有深刻之处,更无厚重之作,令我十分的惭愧。唯对文学现象、地域文学和文学作者以及文学书籍的关注之真诚、探研之刻苦、谈论之热切,方使我的内心稍为一安。80年代至90年代,我从未间断我文学评论的写作,因而,有了近二十万字的这方面的文字,本书编入我各个阶段的34篇评论文章,意在给自己作个总结,这对我于2000年之后的再作文学评论,甚有裨益。更重要的是我想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再走入歧路!

作者

2000.2.27,于见山居



[57] 福建散文艺术论(1990. 4)

——兼评《厦门文学》“海内外福建作家散文专号”

[67] 垮掉与崛起(1999. 12)

——读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

[70] 寻找那棵橡树(1997. 5)

——读舒婷

[74] 青春一族的激情和魅力(1992. 11)

——黄橙诗作漫评

[79] 一颗淳朴炽热的乡心(1982 冬)

——蔡桂章诗歌读后

[84] 咏唱与真情(1986. 9)

——读少白的诗

[92] 女孩子的世界(1988. 5)

——读蔡白萍庄青霞许燕影诗作

[97] 新诗向何处去(1980 夏)

[108] 关于诗歌的震撼力(1983 冬)

[118] 《胡文虎》: 已经获得的和尚未达到的(1988 夏)

[129] 期待超越(1992 冬)

——今声小说创作综论

[135] 《警戒线》的艺术价值(1984. 4)

[138] 收藏激情(1998. 3)

——读张承志

[140]生命的延续(1998.3)

——重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143]谈宋祝平散文的特色(1980冬)

[149]“看海”的魅力(1993春)

——评陈元麟散文集《我们看海去》

[153]认识刘霄(1997春)

——读《情系屋檐下》

[157]真情与诗意酿成的乡土美文(1990.3)

——评李灿煌散文集《闽南相思》

[161]我读《石狮恋》(1990夏)

——致明定兄

[164]表现人与文化的美质(1994夏)

——黄贤庚《武夷掇英》读后

[167]属于散文的时代尚未来临(1989.5)

王元月文化论丛

世纪末的剧变与多元格局的形成

——关于 90 年代文学现象的再思考

无论怎么说,走向新的世纪,首先是向旧的世纪告别,而向旧的世纪告别,世纪末的这最后十年就变得极为醒目。如今这世纪末只剩下四年,前面六年的世事纷扰已成过往,这对于某些领域或许只是新桃换旧符,但,对于文学领域,它则是其大流的延续与拓展。故而,这前面六年的文学现象就不会显得无举足轻重。况且,中国当代文学在 90 年代的风云演变的确称得上剧烈和深刻。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伤痕文学的突现到朦胧诗的论争,从寻根文学的产生到先锋小说的崛起,一直到新写实的滥觞,一波紧接一波,确实形成波澜壮阔的景观,不断地令人欢欣鼓舞。然而,始自 80 年代末,这个火热的局面渐渐不那么火热了,且还透出一种冷的现实。毫无疑问,其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

商品经济对文学的侵入,或者,文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对于共和国诞生以来已形成的中国文坛,不啻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巨大冲击。社会剧变,文学不可能不剧变,其剧变的要害是价值

观念的剧变。无疑，整个中国文坛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当代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挑战，进入 90 年代，这个大挑战更为尖锐和更为不可避免。文学从中心位置转移到边缘地带是最大的失衡。

所有的作家都面临新的选择，换言之，就是作家得重新定位；甚至，文学也面临新的选择，也得重新定位。这确是一件异常痛苦的事情。作家要走入市场，文学要走入市场，但是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走入市场？整个文学都走入市场？显然不是！90 年代伊始，一个“教授卖烧饼”的玩笑把中国知识分子“玩”得太过份了！当然，进入市场是不可抗拒的。一时间，文学界名流下海经商成了“新闻热点”，很是喧闹。今天反观，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尽管如此，文学最初进入陌生的市场的那种尴尬，直到现在，依然存在，这和整个体制与机制是有关的。我们的文学，究竟是以社会效益为重，还是以经济效益为重？多年的经验表明，社会效益好的，经济效益往往并不怎么样，经济效益好的，不少的社会效益又不怎么样。如此两难之状态，尚未解决，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难题也是很不易解决的。那么，如何较为客观评价那些文学界的商海弄潮儿呢？实践证明，利弊皆有，绝非仅仅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是“耻于言利”，“商”在中国文人观念里一直是贬义的。中国的文人有着与生俱来的轻商传统。“下海”的张贤亮、陆文夫们显示了对旧观念的变革，这对于社会的进步，或许起了促进作用。一个蔑视经济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死抱“君子固穷”的旧观念而不思进取的知识分子，前途绝非远大。尴尬的症结皆在价值观的冲突。转型期的中国，是需要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并存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作家都有每个作家的选择。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实现互补的时候，或许是文学尴尬期结束的日子。

当中国文学处于尴尬境地时，有一批作家却显示了一种绝

不尴尬的生存状态。这一批作家绝不动摇地坚守在文学的位置上，他们毫不妥协地进行着自己认为理当如此地进行着的事业。这些人弥足珍贵，中国文坛因为有了他们，才显出不可抗拒的魅力。在我看来，独有这种魅力，足以同金钱的魅力抗衡。精英总归是少数，中国文坛正是有这么一批“少数”，才支撑起来的。在这些人看来，文学是高贵的，是精神的，是理想国。任凭商潮猛烈冲击，就有那么几个犹如磐石地坚守着的作家，这种悲壮的举动实在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之中有像史铁生、张承志、张炜这样的汉子。这是一群堪称不为金钱所动的虔诚的艺术殉教徒。诚然，由于价值观念的蜕变，执着于纯文学的作家人数较之于从前锐减了，文学已经萎缩成原始丛林里的一个小部落，但是，文学的根柢还在，文学的生命未曾泯灭。分流是必然的，分化也是必然的。文学队伍在分流分化之后，更加纯粹，更加精悍，这倒是一件好事。

自然，坚定是必须付出代价的，甚至是大代价。然而，唯有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才会保存下来。这几年中国文坛虽然没有从前的热闹、轰动，但，优秀作品还是接二连三地诞生。如张承志的《心灵史》、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他们或者深入到一种孤独而悲壮的心灵与血泪的历程，或者接近一个原始而崇高的信仰，或者揭示历史的巨变与更替，或者感知和体验人类的生存与痛苦。这一切努力，都为了追寻一种自由，追寻一个家园。这一类高品位的文学作品，若有经济效益固然是好事，若没有，一点也不会贬损他们固有的价值，其美学价值和历史地位绝非金钱能够完全地衡量。坚守文学阵地的人，尽管此刻处于社会的边缘，其实，他们永远是人类精神的中心。

对于 90 年代前六年的文学再思考，一定得重提“王朔现象”，可以说王朔是 90 年代作家最火爆最走红的一位。当文学向低谷滑来，王朔却向峰巅登去，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无论是毁是誉,“王朔现象”毕竟给我们带来可供争论的许多话题。用“痞子文学”一言以蔽之,过于简单化。没有创新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客观地说,王朔的创作是有所创新的,至少是他的文学语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独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王朔无疑为我们开拓了中国文学语言的一角新天地。王朔的文学语言极富个性,显示一种与众不同的语境、语义和语态。王朔的火爆走红与大众传媒紧密相关,反过来说,王朔在推动文学与影视的结合,功不可没,从而也显示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

通俗文学的强大冲击,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从某种角度看,其某些特点与王朔作品的某些特点有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通俗易懂,都具备为人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性。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建国十七年,有些作家曾为此竭尽心力,并形成自己的流派,如赵树理。前些年在读者中极为走俏的通俗文学作家,无论是阿塞·累利、谢尔顿,还是金庸、琼瑶,无一不极“严肃地”创造着绝非不严肃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和语言,否则,他们的作品就不可能打动千万读者并为他们所喜爱。当然,不少通俗文学作品存在着庸俗化倾向,这也是无须讳言的,更甚者,某些作品传播不健康的思想与情调,更败坏通俗文学的名誉,庸俗化问题不只通俗文学才存在,有些非通俗文学(亦即惯称的“严肃文学”、“纯文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庸俗化问题。它们常以刺激性的描写作为调味剂,投合世俗,扩宽销路。以取悦读者为手段,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当通俗文学成了庸俗文学,就完全损害通俗文学的发展。对于通俗文学的无序状态,我们的通俗文学批评在哪里呢?通俗文学创作和阅读的研究与引导,长期被忽略,这绝不是正常现象。

与通俗文学相关的是畅销书这个问题。畅销书这个从国外引进的概念,是这些年文坛和出版界最醒目的字眼。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图书出版销售全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运作,从不考

虑市场需求,自然不存在“畅销”与“不畅销”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畅销”、“不畅销”和“滞销”的现象不存在。文革前,还是出了不少“畅销”的书,如《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近些年的畅销书不乏有好作品,但,更多的书则是一种文化快餐,可称之为短命畅销书。同样进入市场,文化快餐式的书能畅销,文化品位较高的书能否畅销?不仅作者,更有出版者,在这方面作出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少作品的出版及热销,就证明了好书自有其畅销的可能。这样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个体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真正意义的畅销书,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崇高的审美享受和深刻的思想启迪。群体如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丛书”,这是“制造”畅销书的一个有胆有识的举动,也是高品位书籍占领市场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谈论 90 年代畅销书,我们不难发现,高品位的畅销书几乎只归于两类。一类是长篇小说,一类是散文。前者不可避免地艰难迈进;后者则异乎寻常地热潮掀涌。两者同时带给我们一种跨世纪的繁荣文学的期待。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文学创作的水准之最重要的一条乃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新时期以来,短中篇小说创作一直很兴盛,80 年代末以至 90 年代初,则有些微弱。长篇小说创作后来者居上,连续几年一直蓬勃且喜人地发展着,说明了中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对而言,长篇小说创作比起短中篇小说创作更为不易,这不仅在于其“长”,更在于其创作的复杂性,同时,还在于作者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比创作短中篇小说多。长篇小说创作委实是一种积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势头由“短”而“中”,最后至“长”,正是这种积淀的体现。这种积淀,既是文学样式自身的积淀,也是现实生活的积淀,更是作者艺术创造力的积淀——换言之,它是时空与人的共

同积淀。当作者感到所要表达的用短中篇小说已无法容纳或无法展现，自然就操起长篇小说这个重量级形式。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成就，应首先肯定“陕军东征”的劳绩。以《白鹿原》（陈忠实）、《废都》（贾平凹）为首的5部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一时集中地在北京推出，自然在文化界和社会上引起空前轰动。继之而发的是《九月寓言》（张炜）、《无风之树》（李锐）、《纪实与虚构》（王安忆）、《苦界》（洪峰）以及《曾国藩》、《暮鼓晨钟》等一批历史小说。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先锋小说家加入长篇小说创作行列，使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不断出现新的景观。格非的《敌人》、余华的《细雨与呼唤》、苏童的《米》、北村的《施洗的河》和林白《一个女人的战争》等等，这一批从各方面进行探索的作品，使长篇小说这一创作空间变得更为辽阔深邃而扑朔迷离，这些作品无论在生命体验，或者在文学的意蕴，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不过，我们并不因此显得乐观，因为，能够代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的伟大的或杰出的作品似乎尚未诞生。中国当代文坛应该有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荒原狼》、《百年孤独》这样经典之作。如果说，眼下还有一部长篇小说能让我们读后心灵极度震颤（为何震颤且不论），那就是张承志的《心灵史》。不过，把这部书当作长篇小说，似乎还有点勉强，其实，它更像长篇散文。如果把它当成散文，我们确实很难再找一部有如此魅力的长篇小说了。故而，这个时代必然就得不断地呼唤属于它的、史诗性的或非史诗性的杰出的长篇小说。

可以这么说，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散文创作一直不如其他文学样式喧闹和繁荣，无论对比小说，或者对比诗歌，还是对比报告文学。创作如此，理论也如此。然而，90年代散文突然热了起来，其来势迅猛，犹如洪水泛滥于整个中国文坛，仿佛要占据主流。1993年居然被称为“散文年”。散文大热潮的兴起原因固然很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经济改革的冲击。这些年

来,我国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作家的创作自由度越来越大(这就为文学繁荣创造条件,尽管当下的文学远没有达到其该繁荣的程度),而作为最自由的文体散文更需要这种自由度。

散文形成大热潮,随笔创作可谓热中之热。不仅是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一大批中国 20 至 30 年代的散文大师的随笔作品大量的再版,当代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家都创作随笔,随笔自由地表达了他们自己,真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随笔创作如此之热,还得力于报刊的推波助澜,数千计的报刊为了生存,展开激烈的竞争,随笔(包括小品)就备受青睐,几乎成了独一无二的宠儿。散文大热潮使得散文一时拥有众多读者。散文杂志原本甚少,仅有《读书》、《随笔》、《散文》、《散文选刊》,90 年代一下子有《美文》、《中华散文》、《散文天地》、《散文百家》、《当代散文》、《中外散文选萃》、《散文(海外版)》、《书与人》等多家杂志创刊。散文选本及散文丛书难以计数,令人目不暇接。在散文大热潮中,有两个现象颇值得注意。一是出现了“大散文”的提法,这很符合散文本体特征,纠正了从前那种把散文界定为所谓“抒情文体”的狭隘说法。二是出现一批各具风格的优秀散文家,如史铁生、张承志、周涛,而以余秋雨最引人注目。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与文革前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三大家散文的影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把余秋雨誉为中国 20 世纪最后一个散文大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散文热并非没有负面出现,当前的散文创作仍然存在着矫情与虚伪的东西,尤其是沉缅于风花雪月,一味地玩味个人极为肤浅无聊的人生,倒使散文创作从附属于政治的“假大空”走向另一个附属于个人的“假小空”,此中之得失是有待于探究。

90 年代的散文大热潮,应该说是中国世纪末的散文大热潮。它似乎在说明,事物的发展是个怪圈,是圆周运动。本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白话文的典型文本

即散文。而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似乎又将以散文这一文体来划句号作为结束,这真是令人惊诧不已而又意味深长。这或许是中国作家被中国语言所操纵,身不由己地走出的一条曲折之路。

当我们考察 90 年代前六年为大众所欢迎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受欢迎的原因众多,众多原因里有一条,即对于性爱的表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为我们描绘一条曲折且清晰的轨迹。在这条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某些所谓的禁区的突破。这些禁区的突破最怵目惊心的是性爱。随着对禁区的不断深入,文学自身的表现力也在不断加强,加上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长驱直入,在性爱的表现方面,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将笔触仅仅停留在“情”的层面上,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性”的艺术表现领域。80 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还有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等作品。这一批惊世骇俗的小说把“性”赤裸裸地表现在作品里,同时具备了一定的思想品格和较高的审美水平。这无疑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让“性”这一被世俗中国人视为洪水猛兽的东西,登堂入室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先锋小说的崛起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景观,其贡献是多方位的,而在性爱文学方面,其对于生命回归的文学表达更是奇异夺目。性爱是文学永远会产生争论的命题,因为这一命题涉及到最深广的领域,如社会及伦理道德等方面。关于《废都》的激烈争论,也概莫能外。《废都》自有其社会意义的内在呈现,在性爱的表达可看作是 90 年代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文学作品中的性爱之描写,依我之见,仍有文野之分,高低之别。我们所要抛弃的当然是那些纯粹生理展示和感官刺激的东西。有社会责任感和较高美学追求的作家当会严肃看待这个问题,使中国性爱文学在冲出樊笼之后在健康的道路上迈进。

好多年来,中国文学界几乎都认同这么一种说法,即新时期

以来,中国文学仅用十多年的时间,就跨越了西方百年才走完的漫漫长途。这一现象,既令人振奋,又叫人担忧。不过,作为这半个世纪来中西方文化间的一次大碰撞和大融合,还是值得肯定的。比起世纪初的那一次中西文化的大碰撞和大融合,中国当代文化人和作家是更成熟了,这也说明了中国当代社会已经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在批判中吸纳的气度和能力,同时也说明了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变小了——生活在“地球村”的人类,只要不是故步自封,就没有理由拒绝共享人类文明成果。这十多年,五花八门的西方哲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作家的思维空间,不管那一个流派的作家,都普遍重视从文化层面和生命层面来思考生活与表现生活。不少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手法,一些作品表明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对中国作家的深刻影响。不过,切莫忘了,我们是在极度饥饿的时候进入极度饱和的状态,所以匆促问世的作品有很多消化不良的毛病存在。值得欣慰的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国人的盲目性减少了,作家的认识也趋于成熟,他们意识到自我定位的重要性。没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没有主体性的行为,是没有出息的。在这方面,前辈林语堂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那“双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精神和治学态度是富有启示性的。

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这个格局的形成,是整个文学界努力的结果,其中,文学探索者付出的代价最大。90年代这六年,虽然,文学流派繁多,创作面貌复杂,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坛上依然占着主导地位。比如党政部门倡导主旋律,组织“五个一工程”。作家们在表现改革开放和现实生活的主导力量方面有不少作品问世,如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等。特别是95年,纪念反法西斯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出现了一大批表现这一历史事件的作品,其爱国主义和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人类伟大精神之光芒灼灼闪